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城里人 /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12

(读者参考丛书 / 林雨主编)

ISBN 7-80616-809-5

I. 孤... II. 读... III. 文摘 - 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 第 53595 号

孤独的城里人

读者参考丛书(36)

2000 年 12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金 辉 梅 川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3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7-80616-809-5/Z·44

定价:10.00 元

6 111581021

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吗？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
中国的安全环境令人满意吗？美国是在遏制中国吗？

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宋念申整理

围一张普通的圆桌，吃一份简单的盒饭。针对当前热点话题，特邀国内权威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与《环球时报》联合推出小型午间研讨会：清华—环球论坛。

本次议题：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讨论时间：2000年8月9日。

讨论地点：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本次讨论主要发言人：

杨成绪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薛谋洪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缉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楚树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

杨成绪：谈到我们的位置，总有人喜欢评价中国是“几流国家”。我认为，不论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都不宜用“几流国家”这个概念来评价。中国从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核国家之一等方面看，是一个大国。在多极化世界中，像小平同志讲的，“中国算是一极，不应该贬低自己。”如果从经济、科技竞争力来看，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算是前列，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则还有很大差距，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列在第七位（自1995年以来）。但分析具体数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3.3%，而我们的人口则是世界的22%多。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今后发展趋势也会比较快。但应看到，即使10年之后，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如果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年后，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但人均产值仍然只是美国的1/5，我们仍然不能乐观。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是西方集团，也不是东方集团，不是77国集团成员……我们最大的经验是，一个国家只有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贾庆国：我和杨先生有同感，用一流还是二流国家的概念来衡量中国不太合适。

判断一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国际地位,常常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容易流于主观,说强或说弱,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观察者本人的看法;二、很难提出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标准。

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来说,我想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这方面我们并不比西方人差,中国人的理念追求中包含了平等的概念,不仅是机会平等,而且也是对各种资源占有的相对平等。这种观念在世界上是具有潜在的号召力的,因为平等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是无法割裂开来的。二是发展水平问题。从综合发展水平看,中国是一个介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治上的一些改革。三是军事方面,经过多年的国防建设,中国的国防力量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我国的安全需求并不相称。总之,过去20年,中国有了非常快的发展,但和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还须加倍努力。

楚树龙:中国的位置问题既是外交战略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我国政府一直强调两句话:一、中国是大国;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学术上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在有些方面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我认为,大国不一定是强国。我们是一个世界大国,但还不是世界强国。

经济上,如果我们保持7%的年增长率,2008年我们的GDP会再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而今天德国GDP已经达到了2.2万亿美元,它今天不过位居世界第四。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实力,不等于经济质量。今天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在世界许多高科技领域里,中国并不是领先的。而且军事上的差距我们也并没有缩小,这些方面的竞争力我们需要加强。

我们的方向是建设强国。对外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参与。但“全面地参与世界”不等于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利益,全面的作用,全面的影响。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我认为战略是利益的追求,中国并不是一个强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延伸到世界更多的地方去,所以还是应当主要关注亚洲,制定区域战略似乎比国际战略更现实一些。

王缉思:中国是几流国家,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关心这本身就是特色,因为中国曾经是世界一流国家,将来要振兴,再次成为一流国家,而现在处于一个中间阶段,所以总是提出要赶超目标。反观其他许多国家,大概只有俄罗斯的这种想法特别强烈。就像在中国学校里,我们总想在分数上排名次,而不特别重视学习效果究竟如何。问题是,我们只能更好地发展自己,而没有办法让

别人停滞。所以,提出把自己在世界上排名提前的目标,有一定的盲目性。而且以今日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推算将来,也未必科学。70年代有人曾经推算说,2000年苏联将赶上美国;80年代末又有人推算说,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今天都清楚。

所以,当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在科技水准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必急于给自己定一个赶超目标,不必过多关心自己属于几流,而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包括生态、福利、社会公正等等。

阎学通:我按当年的汇率计算,将1980年到1999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上一些国家比较了一下,发现:一,中国经过20年的努力,名次上是否进步了,进步速度是快还是慢,主要得看是和谁比。如果是与原来其国民生产总值就比中国小的国家比,则我们是更强了,而且强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和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发达国家比,我们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没有变化,比如和英、法、德等国家。与俄罗斯对比的情况特别,我们20年前是它的44%,现在是它的2.3倍,但这就像王缉思所提到的,其原因并不单纯是我们发展了,而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停滞了。另外突出的一点是,我们和美、日的差距不但

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比例扩大了,绝对值的差距就更惊人。只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汇率比较国家实力也许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情况,但这种比较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第一,我们还是一个地区大国,客观上讲,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利益以及它所能发挥主要作用的地区,就在其周边。第二,冷战后出现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划分世界的统一标准,国家的差别很大而且变化很大,国家对具体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即使军事上的盟友在具体国际问题上也会采取相反的立场。因此,我倾向按区域来划分世界。当今世界区域的共同性在增强,共同利益在增加,所以中国的属性是一个“东亚国家”。第三,我们的对外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地区事务上而非世界事务上。我们一直在谈多极化,但到底我们是采取国家多极化策略更好还是区域多极化策略更好呢?法、德等国家都认识到,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世界的一极,才能构成与美国同等强大的一极。而中、日、俄、印等一些国家采取的基本上是国家多极化的道路。这两种多极化哪一个战略更容易成功、现实性更强,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贾庆国:王缉思先生主张不提“赶超”,可我觉得提“赶超”没有错,关键看你赶超什么。有比较,才可以看到差距,也才有了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赶超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

优势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全球化带来两极分化问题。我一直觉得,全球化只是资本、信息和部分精英的全球化,但不是劳工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将劳工用国界分割开了,结果国际劳工利益不同,很难团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单个国家很难改变这种情况。从理念上讲,中国应该追求平等,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又不得不参与全球化。中国现在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只能尽量利用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去发展,在自己国家实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改变现行国际体制的各种弊端。

薛谋洪:今天的讨论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实力,以及外交政策是否正确。实力是基础,弱国无外交。而实力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实力。尽管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有些还相当严重,但20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确有明显增长。我不同意笼统地说我们和美、日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衡量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经济规模”,似应考虑各国货币购买力平价这个因素,根据世界银行《1999-2000世界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当然,衡量经济实力的另一个重要尺度是“发展水平”。在这方面,人均收入是个值得注意的因

素。即使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998年的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1/10。中国应力争在发展水平上也成为强国。

王缉思:有人说目前有些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敌意在增加,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道障碍,我非常同意。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主流上,中美差距越来越大,日本、欧洲也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怀有敌意,期待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淡化,并不现实。

楚树龙: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美国也还是有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势,至少在行政部门是这样。我认为现在的美国在逐渐寻找一个成熟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当然通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没有停止,确实增加了对中国的战略警惕,这主要是美国的情报和军事部门。

王缉思:目前我国的外部环境对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较大。处理好国内问题,感受到的外部压力就会小一些。正因为美国处处在政治上打压中国,每年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投票表决,鼓励台湾和西藏的分离主义势力,所以我国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的分量也在加重。如果单就传统的领土安全来说,外敌入侵的危险不大。

阎学通:我个人认为,说到中国最好的安全时期,应该是1989年到1996年那段时间。那时候我们

没有卷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1995年前，我们甚至不可能想象中国可能卷入局部战争。而现在由于有了台湾分离主义因素，卷入局部冲突已不是不能想象的了。

楚树龙：安全环境是否就是指没人打我们？还是包括分离势力对我们的威胁更近还是更远？因为安全本身包括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当然也就包括统一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谈，我同意阎学通的观点，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环境比四五年前要严峻。

贾庆国：是否有谁在酝酿一个“反华阴谋”呢？我想直接针对中国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反华阴谋集团不太可能存在，但是想遏制中国发展的人和集团是很多的，尤其在西方一些国家。

楚树龙：很多人把对中国的反对意见归结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国内有很多人担心美国遏制中国，或者即使不像对前苏联那样的遏制，至少也是一种软遏制。我不太同意这样的提法，我觉得美国不是要制约中国的发展，而是要制约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第一，它不相信我们会发展到威胁它的程度，第二，发展本身是谁也阻止不了的。日本也在发展，但是在美国的体系内发展，所以美国可以容忍，它可以利用体系来制约管理。另外，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我觉得不是遏制也不是接触，而是改变中国。这条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今天和50年

前仍然是一样的。

薛谋洪：这样说并不完全，美国当然想改变中国，但它是用两手，实际上“改变”政策和“遏制”政策并不是排斥的。因为美国对能否改变中国方向并没有很大把握，所以仍然在防范着中国。从这点讲，美国对于我们是这样，对于日本也是这样。美国并不是放手让日本发展，日本想独立地去搞飞机、搞卫星，美国就不允许。所以美国在控制方向上还是限制我们，比如高科技就不卖给我们。主要还是一句话：它不会允许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在力量上可以挑战美国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楚树龙：对。所以我喜欢用“防范”一词给这样的局面定性。我觉得我们所谓的“遏制”措施（美日同盟、技术限制等）更多的不是遏制而是防范，防范表达着一种不确定，一旦接触战略出现变化，它可以有现成的准备迅速将其转为遏制。

阎学通：“中国威胁论”的存在本身就表示某些国家对的一种担心和害怕，有担心当然就想消除担心，这样的心态就导致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强大并不十分愿意；但现在还不至于出现联手遏制中国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想搞一个遏制中国的联盟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上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所以美国等一些国家在更多情况下对中国是防范的政策。

防范是在方向和力量两个方面

加 快 全 国 一 体 化

□管荣开

使农民充分享受一般的、真正的“国民待遇”，这是比给外企“国民待遇”更为重要的大事情。

如果不彻底拔掉城乡之间的藩篱，清除城乡交流道路上的关卡障碍，真正实现国内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而以目前这种城乡严重隔离的状态来应对全球一体化，如何经得起冲击？

如果出现“条条”闹独立，“块块”搞封锁，各搞各的“山头”，就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正值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所谓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贸易自由化。“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就是这种趋势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大趋势面前，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自然处在进攻的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防守的劣势。进入新世纪，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相比

经济落后的小国总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地位，大力借助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充分发挥我国大一统的政治优势，加快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民间因素，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和扩大我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是消除工农“身份”划分，扩大就业门路，增加群众收入。众所周知，我国长时期内是一个中央集权型的二元经济体制，整个社会形成“内核是干部、中层是职工(工)、

的。但我的看法和楚树龙的有一点区别：我认为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制约中国的实力，方向上的防范则是第二位的。因为综合比较，牵制实力比牵制方向容易得多，手段上也多一些，比如通过技术禁运可以限制你技术水平的提高，但要改变社会制度则难得多。所以客观上美国

会在实力防范方面做得多一些。

美国人通常的观点认为，意图的改变是不确定的，实力的改变相对是确定的。所以它对实力会更看重一些。说句开玩笑的话，即使我们今天把美国的宪法照搬过来，美国也不愿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摘自《环球时报》)

外圈是农民(农)”的圈层结构。“农民”不仅是职业的称谓,更成为固定身份的“称号”:农民的收入是最少的,农民的地位是最低的。改革开放使这种社会圈层结构受到极大冲击,但在整体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人均少得可怜的集体土地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只是“保命地”、“保险地”,但不会是“致富地”,有时反而成为束缚农民的“绳索”;“减轻农民负担”说了若干年至今未见明显效果,甚至还在加重;以前国有企业职工的诸多福利如劳保、医疗、退休待遇一般农民丝毫没有,亿万农民剩余劳动力缺乏就业门路少人问津。

撇开这些不谈,只讲农民进城打工备受艰辛,却还要被当作“盲流”对待,到要安排“下岗职工”时则首当其冲成为清退的对象。所谓“内需不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收入高,高到只想购买“洋货”;多数人收入低,低到连“国货”也买不起;主要就是占全国7亿劳动者50%的3.5亿农民的劳动收入太低,占总人口75%的9亿农村居民购买力太差。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将受到严重冲击,首当其冲的自然又是农民。关键是我国以及世界市场不需要这么高比例的农业社会劳动,农民严重“过剩”。要大力解除对农民的身份禁锢,继续放宽对集体土地承包权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给其提供比较容易的获得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自由宽松条件,促进或至少不再

阻挡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使农民充分享受一般的、真正的“国民待遇”,这是比给外企“国民待遇”更为重要得多的大事情。解放生产力,说到底还是解放生产者。3.5亿农民的劳动潜力和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二是拆除城乡藩篱,促进城乡交流,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社会经济二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城乡隔离,就是农民进城难,农民要变成“非农民”难。由此形成“内圈小、外圈大”的社会圈层结构稳固僵硬,难以改变。我国长期实行的户口管理体制是造成工农差别、城乡隔离以及城市化滞后的制度原因。改革开放前的城乡隔离是界限分明的,一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制度规定把整个社会人群一分为二,相配套的粮油供应体制、住房分配体制、劳动用工体制好像层层藩篱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截然隔开,一隔就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了,农村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城市搞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现在又搞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这层层藩篱已经被捅破了好多漏洞,但总的说藩篱还没有完全拆除。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社会身份、地位、待遇并没有得到公正、切实的法律保障,受歧视、遭虐待的事常有所闻。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达到空前的3.71:1,正是这种隔离的直接后果。就从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讨论来看,无论是主张

小城镇道路、中等城市道路抑或大城市道路的专家、学者，即使是很“激进”的人物，分歧的焦点也只是哪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而很少从“农民的权利”角度考虑：农民到底有没有进城的自由？有没有迁徙的权利？有没有到他认为最合适自己的地方（无论是小城镇、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劳动的权利？实际上，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其发展都是政府和民间投资的结果；而投资带来劳动机会，劳动者流动的规律则是与投资和劳动机会保持同向。如果政府只是把资金投向大中城市，而仅让农民留在农村，至多也只到小城镇，这种导向即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一旦实行，必然更加拉大城乡差距。如果不彻底拔掉城乡之间的藩篱，清除城乡交流道路上的关卡路障，真正实现国内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而以目前这种城乡严重隔离的状态来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岂不是以散沙迎巨浪，如果经得起冲击？

三是打破所有制界限，搞活产权，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重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结果就是效率普遍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从目前看，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强大国营（或国有）经济力量自然不可忽视；但要严格管理，特别是要打破原来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允许民营企业与之展开竞争。在本来可以竞争的领域，

国有企业的垄断绝对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其实是为了部门的、小集团的利益，说到底是为了私人利益。对于真正的民族经济，在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如果说外国企业的进军是“狼来了”，则原来国有企业的垄断就是“虎踞着”。在企业待遇上，必须打破传统的所有制分野，充分开展公平竞争。对于每个劳动者和每个企业，就业上岗都应该双向选择，劳动保障制度、法律要健全，政府不要过多干预。正像任何产品的制造、创造都不过是物质要素的优化排列组合一样，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增长，实质上都是科技要素、社会要素或经济要素的优化重组。打破所有制界限，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消除现有体制障碍，使生产力要素能够按照优化的方向更加润滑、自由和顺畅地排列组合，更少摩擦，更少阻力。

四是冲决地区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中国行政领导体制的特色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条条”领导和“块块”领导相结合。这种“结合”客观上要求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事权、责任都要划分明确。这种体制下的分工负责如果搞得不好，就容易导致互相扯皮，甚至互相掣肘，把有限的能量用在无端的“内耗”上。如果出现“条条”闹独立，“块块”搞封锁，各搞各的“山头”，就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就要依法治国，以

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为根本目标,彻底打破地区封锁,实现“全国一盘棋”、经济一体化,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最终形成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强大、统一的“拳头”力量。

五是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规范性,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开发力度。中国的国情是:任何地方经济的发展,除了自然地理条件之外,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投资规模是重要因素。国家对西部地区投资较少,即使是最高的1998年也只占全国的14.5%;实行国家优惠政策的沿海城市、经济特区都在东部。结果导致1990至1998年地区GDP的年均增长,我国西部仅是10%,比东部慢4个百分点;1990至1995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不公平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带来社会的、政治的危险。不应当,也不可能容忍不平等无止境地发展下去。”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不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也制约着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如果说,市场经济力量容易产生“马太效应”,使贫富差距拉大,则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必须是要保障东中西部均衡发展,减缓地区差别。当前,西部发展最需要的就是中央、全国的支持,包括资金的支持、知识的支持等。为此,必须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

开发力度,实行比对东部更加优惠的招商引资和引进人才政策,加强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和规范性,保证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决策的落实(当然也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国家投资的效率和效益)。今后,东部的发展应该也能够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吸引外资和民间资金,吸引人才;而西部的发展则主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也要“通过”市场)来推动、促进。要认识到,这不是对西部地区的施舍和恩赐,而是国家协调平衡发展和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所绝对必要的。

新世纪之初,我国将加入WTO,这是进入经济全球化关键的一大步。当此之时,我们必须积极地消除国内工农、城乡、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障碍来主动应对,绝不能消极地等待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被动应付,由此减轻经济全球化给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而充分利用其同时给我们带来的条件和机遇。二千多年前,万里长城成为抵御外敌侵入的人造屏障。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逼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拆除一切外在的、旧体制的、妨碍发展的断壁残垣,加紧构筑由高新技术、低廉成本、先进管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优良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组成的新的、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十年之中，WTO 成员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有 247 起，裁定倾销罪名成立的占到 64%

我们为什么总被反倾销？

□马 克

为什么拿新加坡的标准衡量中国产品？

8月7日，以厦华、长虹、TCL等7家联合应诉的彩电企业为主角的“应对欧盟反倾销研讨会”，并未如人们想像的那相开成一个打赢官司的誓师大会。相反，他们的共同律师、布鲁塞尔 VBB 律师事务所律师付东辉的预测还让人感到泄气。付的结论是：中方通过举证说服欧盟委员会裁定自己胜诉的可能性只有 10%。这场官司的惟一转机是对有 12 亿美元在华投资的原告飞利浦晓以大义促其撤诉。

应诉最积极的厦华老总郭则理当天也表现得十分低调，他对记者们说：“不应诉肯定死路一条，应诉尚有一线生机，反正是死，不如一拼。”

事实上，彩电企业的处境正是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官司中的缩影。

据 WTO 反倾销委员会统计，1987 年到 1997 年间，各成员国提起反倾销调查案 2196 起，共有 1034 起裁定倾销成立，裁定率 47%。这其中，对中国产品的调查有 247 起，

占总数的 11.25%；158 起裁定倾销成立，占总量的 15.3%，裁定率高达 64%。这三个数字均列各国之首。把这组比例与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97 年是 3.8%）相对照，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已经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

我们为什么老被反倾销？我们为什么很难打赢反倾销官司？

最核心的原因：我们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一剑封喉的定性让我们多次蒙冤受屈被动挨打。第二个原因，我们是一个迅速崛起的让许多国家暗怀戒心的国家。

WTO 将倾销定义为：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正常价值”的确定有两套标准，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是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价格相比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合适与合理的”，就可用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国参照。如此行事的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资源由政府控制,企业多属于政府或受政府干预,其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这一论述隐含着如下潜台词:倾销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行为。

因此,当面临反倾销官司时,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就处于先天的不平等地位:你事先已被假定有罪了,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来证明自己无罪。如此一来,企业的运营成本肯定会增加,即使官司赢了企业竞争力也会被削弱。

于是企业往往放弃打官司,结果则是丢掉出口市场。

彩电行业就很典型,据报道,1993年之前,中国彩电年出口欧盟100万台以上,仅厦华一家就达30多万台,可几轮“反倾销”下来,去年的总出口才3万多台。

此案的参照国,欧盟选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倍都不止,以它为参照,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立即化为乌有。

据了解,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案例中,80%以上选择的是自己的成员国。

从理论上讲,如果中国企业积极应诉,打赢官司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来证明无罪代价高昂,二来官司会无穷无尽。因为随着中国日益强大,走出国门的企业势必越来越多,走出去了就要和别人竞争,在一个歧视性的环境里,反倾销官司必

然源源不断。

对付反倾销的惟一办法: 市场取向的改革

有人援引刚刚结束的中韩大蒜贸易战,指出解决办法是我们对对方施以对等的歧视,你对我的彩电征税,我就对你的汽车征税。但有专家指出,贸易战的背后是实力对比,跟韩国可以打贸易战,跟美欧日就不可以。另一方面,非市场经济国家只有独联体部分国家、越南、朝鲜等20个左右国家或地区,市场经济国家有近200多个,都以牙还牙的话,全世界岂不都成了我们的敌人?第三,这个世界不可能同时并行两套规则,一套适用于200个国家,一套适用于20个国家。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已进行多年,为什么我们还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外经贸部研究院副研究员马宇的回答很简单:国为改革还没完成。他从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程度、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别待遇程度、法律对公平竞争的保护程度等几个方面做了分析,结论是目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只有50%左右。

中国加入WTO的15年内,美国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法对中国进口产品仍然适用。美国用来判断中国产品是否倾销的办法(即第三国参照)保持不变。

日本自卫队向海外伸手

□武 君

日本防卫厅 8 月 24 日正式向自民党国防关系部会提出明年的国防预算要求,总额为 49960 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07 日元),比上年度增加 1.4%。最近一个时期,按照和平宪法执行“专守防卫”政策的日本军队,正加紧充实军事实力和扩大活动领域,使日本不但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强国,而且能够在军事上进入大国行列。

引进空中加油机, 扩大作战半径

据日《产经新闻》8 月 23 日报道,日防务预算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下年度防卫厅将引进 4 架空中加油机,每架飞机所需的预算经费为 200 亿日元。引进一架空中加油机是日本明年国防预算的新内容。日本防卫厅已为此争取了多年,防卫厅长官虎岛和夫日前就引进空中加油机问题做出过明确表示。

中欧协议的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根据 WTO 的原则,中美协议适用于任何一个 WTO 成员。

反过来,中欧协议也适用于所有成员。

听起来这颇有点受制于人的味道,但是现实就是如此。马宇说,一

虎岛和夫强调,“加油机理论上延长了战斗机的脚,但可以合理地运用”。这显然是为了减少外界对宣称“专守防卫”的日本增添进攻性武器的疑虑。日本媒体的有关报道解释说,所谓“空中加油机的合理使用”,应该也包括“在空中实施警戒待机”、“日常飞行训练”等项目。防卫厅宣称,空中加油机的引入是从装备更新现代化的角度出发的,旨在用于对空中航空机的加油和国际合作活动的运输。无论日本如何解释,日本引进空中加油机后必然会扩大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因此,其目的不言而喻。

借口防范海盗, 加强远程侦察能力

日本《朝日新闻》8 月 21 日报道,日本政府声称,为了防范海盗,计划为海岸警卫队配备 2 架远程侦察机,要求这种侦察机的航程能够

方面承认并遵守 WTO 的规则是我们加入 WTO 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承认我们目前的体制不合理,所以我们才要改革。而且,加入 WTO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摘自《南方周末》)

达到 12070 公里,这样侦察机能够在日本和马六甲海峡之间往返一次。有消息透露,日本海岸警卫队希望将最新型的远程客机改装成他们需要的这种侦察机。

拥有先进的侦察机后,日本就有能力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越南等进行情报侦察活动,这正是日本军方一直希望扩大其活动范围的作战思想的体现。目前日本拥有大约 100 架美制 P-3“猎户座”电子侦察机,这种飞机能够对日本周边水域的潜艇活动及其它船只的活动进行准确的监控。另外日本还有两架改进型波音 767 飞机,机上装载有空中预警及指挥与控制系统。上述飞机的航程较短,而且日本尚未具备空中加油能力,活动范围受到了一定限制。多年来,日本在尽量不引起周边国家反感的情况下,适度地扩展着其活动范围,目前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表示愿意让日本加入多国巡逻马六甲海峡的活动,并同意日本飞机使用他们的军事机场。

拥有了远程侦察机,日本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对中国沿海的军事基地进行侦察活动,如果日本使用最先进的机载传感器,将可以进行照相侦察活动,并截取电子信号。新型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使用被动探测系统和脉冲多普勒雷达,能够发现非常小和具有一定隐形功能的目标。由于日本很有可能具有美军最先进的侦察技术,据称,美军 E-8C“联合星”侦察机可以在离目标大

约 200 公里的地方进行侦察活动,所以日本可以在远离他国领空的地方执行侦察和情报收集任务,此外,日本发展本国侦察能力的另一个目的是逐渐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建空中特种机动旅, 加强机动能力

根据新防务力量整备计划,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从今年起,将原第十二师改编成日本第一个空中机动旅,编制人员约为 3000 人,配备 AH-1X 武装直升机 8 架,OH-1 观测直升机 9 架和 UH-60 运输机 8 架。新成立的直升机队中,除 OH-1 直升机为日本国产直升机外,其余都是从美国购买的,其中 AH-1X 攻击直升机是新一代反装甲攻击直升机,攻击性能极强,目前仍由陆上自卫队进行性能需求评估,未来可能会向美国购买具有全天候攻击性能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从第一空中机动旅的直升机来看,数量为 33 架,防卫厅高层人士认为偏少,以荷兰最近建的空中机动旅为例,其地面部队有 2700 人,但拥有直升机达 60 架;而英国的第二十四空中机动旅总兵员为 5000 人,配有直升机 108 架,尤其考虑到直升机平时进厂保修,临时故障,乃至战时的损耗,日本防卫厅高层人士认为,日本至少应配备 60 架。

今年 4 月 2 日,在日本千叶县举行了一场新编空中机动旅的直升机表演,参加的机种包括 OH-6D、

AH—1S、UH—1J 和 CH—47J 直升机等,展示项目包括 CH—47 吊挂表演,第一空降团的低空跳伞,UH—1J 的空中布雷,及 UH—1 载运突击队员突击的表演。自卫队利用假日在略偏僻的郊外作一次小型的表演展示,结果竟吸引了来自东京地区约 5 万民众前来观看,展现了新编部队的风貌,现场也有日本自卫队的人才招募中心指导观众加强对装备的了解,并进行招募人员的活动。

筹划建造航母, 增强防空能力

日本国内的重要资源,几乎全部都依赖外国进口,因此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就成为日本国防的一项最重要课题。因此,日本一直想拥有航空母舰,并积极筹划设计建造日本人自己的航空母舰。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考虑建造 2 艘 4 万吨级的轻型航空母舰。海上自卫队在其内部《长期军事力量建设》报告书中说,到 2015 年,日本将建造可装载 E—2C 级预警机和 V—STOL 级垂直起降战机的两艘轻型航空母舰。日本去年建造了一艘名义上是“运输船”的准航母——“大隅”号运输舰。

目前,日本筹划建造的航空母舰是所谓的“防卫型的航空母舰,目的是让其战机能迎击敌人飞机或导弹对其海上运补线的威胁”。在航母舰载机方面,日本军事专家指出,现在日本所使用的各型战机中,

F—14 战机是理想的航空母舰搭载机种,因为该机配备有可同时攻击 6 个不同目标的 AIM54 空对空导弹,该型导弹射程达 100 海里,能在敌机发射空对舰导弹前,先将其击落。日本理想中的防卫型航空母舰只需搭载 32 架 F—14 和 8 架 E2C “鹰眼”型空中预警机即可。所以,这型航空母舰全长应为 300 米,宽 42 米,高 11 米,具有 5—6 万吨级规模。甲板上起飞跑道旁必须有供战机降落用的斜角甲板,3 套飞机弹射器的 2 套装置于舰艏,另一套装置于斜角甲板上,这样,斜角甲板兼有让飞机起降功能。机库设于飞行甲板正下方,在机库前、后、左、右各有一部升降机。在动力方面,日本倾向于使用核动力。这艘日本理想中防卫型航空母舰的舰载官兵人数,军事专家认为如果能引进美国正研发中的新型驱逐舰“DD21”的管理系统,可控制在 1000 人以下,大约在 600 人左右。

此外,最近日本还企图修宪赋予自卫队海外派兵权。过去 50 年来,在战后宪法的规定下,日本自卫队谨守自卫原则,不参与海外事务,不过这种想法目前已有变化。日本国会准备修改宪法赋予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权力。在已经结束的众院选举中,宪法第九条——“日本自卫队以防卫为原则”的规定一直是政党争论的焦点,日本民间对此的态度也十分复杂。

(摘自《环球时报》)

本·拉丹的“恐怖西点”

□ 萧 战

1998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恐怖分子残害了伊朗9名外交官,举世震惊。阿富汗东部原本无人问津的恐怖分子训练营立刻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

该训练营的主要创始人是著名的恐怖大亨乌萨马·本·拉丹。

1982年底他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前往阿富汗,在东部边境建立了16个恐怖分子训练营,这些营地成为恐怖分子心目中的“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是美国军官和名将的摇篮,它把许多普通青年变成英雄。与此戏剧性地相对应的是,拉丹创立的“恐怖西点”是世界恐怖分子成长的“魔城”,培养了许多出名的恐怖狂。

拉丹今年42岁,其父是也门人,后移民沙特阿拉伯,因曾为沙特的亲王新建别墅,与王室关系密切,有机会承建大工程,故成了建筑大亨。他还曾赴英国学习机械工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拉丹欲效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通过伊斯兰圣战夺权。他组建阿拉伯志愿军,赴阿作战并获得美国支持。80年代末,拉丹返回沙特重操建筑业。

后因从事反美与反沙特王室活动,被沙特取消国籍,转而至也门、苏丹发展。

1994年,拉丹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城附近,收购了大量美、苏遗留在阿富汗的武器,建起全球最大的恐怖分子训练营,那里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恐怖分子“发祥地”。

90年代中后期横行的恐怖分子或“圣战”冷血杀手,很多是毕业于拉丹的“恐怖西点”,学员在世界各地进行“圣战”和恐怖活动,几乎凡有穆斯林激进分子参战的战场,都与“恐怖西点”有关。

该营地出了一些著名“校友”,其中包括涉嫌1993年杀害美国中情局两名雇员的米尔·卡西,制造1993年美国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穆罕默德·萨拉马和涉嫌制造美国驻内罗毕使馆爆炸案的穆罕默德·乌拉。1998年“八月恐怖事件”的制造者也出自乌萨马专设的“塔利班战士训练营”。

在过去6年里,至少有1.4万名左右的穆斯林青年穿过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关口,来到恐怖营接受培训。

在营地,学员们每天的生活是

为俄罗斯 捏把汗

□明 天 编译

以做清晨祷告开始的。在背诵《古兰经》后,他们开始吃早饭,然后用3个小时学习各种武器的性能。午饭后,他们用两小时进行实弹训练。晚饭前踢一场足球。晚饭后一天的训练生活就结束了。

“基础训练”持续半个月,此后一些学员将被邀请参加下一轮培训,其中包括如何搞爆炸,如何做一名自杀性杀手。

学员们住的是简易帐篷,营地周围设有铁丝网。营地里建筑物大多是煤渣砖建造的简易房屋。那里没有电和活水。教员用简易的粉笔和黑板教学。

清教徒式的生活,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穆斯林宗教洗礼,使本·拉丹的恐怖营看起来像是教徒学校。但是,拉丹设营不是为了宏扬穆斯林精神,完全是为了经营恐怖事业。他之所以要为训练营披上宗教的外衣,是因为他要巧妙利用绵延千年愈演愈烈的宗教斗争掩护他的恐怖事业,培养具有穆斯林宗教献身精神的“恐怖人才”。

在培训营地,拉丹被奉为“真主的信徒”、“伊斯兰战士”或被尊称为“狮子”,营地课堂的墙上写着他的名字,门上贴着他的照片。

“八月恐怖事件”让拉丹的“恐怖西点”声名大振,越来越多的穆斯林青年正前往那里。

在21世纪,人类将要与恐怖主义作长期的斗争。

(摘自《军事博览报》)

从核潜舰沉没到电视塔失火,俄罗斯近来可谓祸不单行。因此浮现的事实是,由于前苏联的许多设施老旧失修,加上苏联解体后的无序状态,法新社和路透社记者认为,俄罗斯正开始进入一个灾难的年代。

俄罗斯内政部8月28日发布新闻稿说,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的火灾已被扑灭,但有1位消防员和2位民众不幸丧生,救难人员已经找到他们的尸体。之前外界一度以为,被困在火场的有4人,包括3名消防员和1名电梯操作员。

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的大火虽已扑灭,但却给俄罗斯留下了许多教训。奥斯坦基诺电视塔以往是俄罗斯国力强大与技术先进的一个象征,它的失火成灾,和俄罗斯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库尔斯克”号日前沉没海底一样,都揭露出一个让人思之不寒而栗的事实:由于前苏联的一切设施老旧失修,加上苏联解体